

绿色城市更新视角下西安遗址公园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王新文, 黄 灿, 刘 飒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伴随古都西安城市现代化进程而发展的遗址公园数量众多、分布广泛, 是平衡古城保护与建设的重要方式, 也是新时代公园城市语境下城市更新的重要动力。以西安主城区 28 处遗址公园为主要研究对象, 基于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整理, 回顾近四十年主城区遗址公园在城市空间中的演进过程, 利用 ArcGIS 技术进行缓冲区分析、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叠加分析, 以此探究主城区 28 处遗址公园的现状空间特征。结果表明, 28 处遗址公园呈“单核”分布, 具有服务范围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联系性不强等特征。从西安绿色城市更新视角下遗址公园与城市“空间-功能”的互动关系出发, 通过对典型遗址公园案例的实证研究, 总结归纳遗址公园的三类空间发展模式, 分析其空间特征和实现的空间效益。本次研究结果可以为西安遗址公园空间发展模式研究、基于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及空间布局的城市绿色更新发展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绿色城市更新; 遗址公园; 发展模式; 空间特征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2)06-0890-09

Study on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 of Xi'an heritage pa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urban renewal

WANG Xinwen, HUANG Can, LIU S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apital Xi'a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modernization, there are numerous and widely distributed heritage parks, which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renewal in the context of park city in the new era. Taking 28 heritage park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this study review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heritage park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uses ArcGIS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buffer analysi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spatial overlay analysis, so a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28 heritage parks in the main urban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28 heritage parks present a “mononuclear” distribution, with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but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weak connection. Start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ritage parks and urban “space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an green city renewal,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ypical site parks, the study summarizes three type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ls of heritage parks, and analyzes thei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benefi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n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model of Xi'an heritage park and the urban green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layout of the heritage park.

Key words: green urban renewal; heritage park; development mode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 绿色更新成为推动丝路沿线城市转型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丝路沿线城市绿化水平虽显著增加, 但仍存在绿化指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绿地功能复合度和

服务品质不高、公园开放共享不充分等问题。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应将绿色更新的发展目标与“城市之上建设城市”的发展模式统筹考虑, 需在原有历史文化基底和空间形态布

收稿日期: 2022-11-13

修改稿日期: 2022-11-25

基金项目: 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2022-XZ-38)

第一作者: 王新文(1974—), 男,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城市遗产保护。E-mail: 284917006@qq.com

通信作者: 黄 灿(2000—), 女, 硕士生, 主要从事城乡规划、城市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E-mail: 1042208026@qq.com

局基础上进行保护继承与创新^[1]。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安陆续建设的遗址公园^①已成为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城市形成一种互融、互动与互促的关系,对优化古城格局、保护古城风貌、完善功能结构和美化人居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绿色城市更新以城市更新发展过程中生态价值实现为出发点,关注城市空间物质形态、设施功能布局、资源循环利用、绿色治理管理等要素的品质提升^[2],利用低碳可持续的方式来改善城市物质空间、保护延续人文空间,以达到“衰败”区域重建和城市高质量发展^[3]。从城市空间发展与遗址公园的互动关系来看,遗址公园是将城市中保留的历史遗迹组织到区域现代化发展中的过渡缓冲场所,其与周边要素重新形成一种和谐的公园体系。不同区位遗址公园空间发展模式不同,有研究指出城市郊区型为“整体或局部搬迁+遗址本体保护+生态环境修复”、城市边缘区型为“整体搬迁+遗址本体保护整修、局部复建+历史环境修复”、城市核心区型为“局部或逐步搬迁+遗址主要节点保护展示+博物馆展示”^[4]。现有研究对遗址公园保护模式和类型特征关注较多,但对遗址公园与宏观空间布局研究较少,本文在“一带一路”城市绿色更新发展背景下,梳理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和城市空间发展阶段特征并探究二者关系,归纳总结遗址公园空间发展模式及空间效益,提出优化策略以促进“园、城、人”和谐共生(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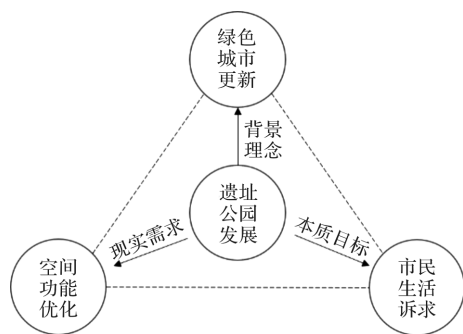


图1 绿色城市更新与遗址公园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urban renewal and heritage park

1 西安遗址公园空间发展演变规律

基于数据资料等方面考虑,本文选定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据统计,西安市公园绿地面积78.7 km²,公园总个数144个,主城区用地面积900.2 km²;目前,西安主城区共有28处遗址公园,总面积达30 km²,占西安市公园绿地面积的38.1%,占公园总个数的19.4%,占主城区用地面积的3.33%,由此可见,主城区遗址

公园在西安绿地系统中占有较大比重,分析近四十年来遗址公园在城市中的演进过程及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宏观把握遗址公园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1.1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发展历程梳理

民国时期,西安开始了城市现代化建设,莲湖公园和革命公园均依托城市中重要的历史遗址建设,为古城增添了新的空间类型,这不仅是西安市遗址公园最早雏形,亦是城市更新的绿色起点。1953年,西安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中提出保存唐长安和明清时期城市空间格局,并倡议在历史名园或遗址所在地上规划建设公园绿地。1958年,兴庆宫公园依托唐兴庆宫遗址建成开放,在保存历史遗迹、展示文化内涵的同时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及周边市民的休闲游憩场所,初步体现了公园与城市发展间的互动。

1980年,西安第二次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中首次提出“遗址公园”构想、保护明城格局完整性、凸显唐长安格局以及保护周秦汉唐重要遗址^[5]。1983年,环城公园建成既保护了遗址又增加了城市公园绿地指标。1995年第三次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提出保护、恢复和展示唐大明宫遗址,开始从城市整体考虑对历史遗址的保护对策和方法,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来促进遗址保护利用。此阶段遗址保护思想已从单一个体遗址保护展示转向系统整体的古城空间格局延续,对遗址公园模式的探索与实施也逐渐成熟。

2005年,《西安宣言》强调遗址“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西安加大了保护力度,遗址公园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陆续修建了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唐城墙遗址公园等不同文化主题的遗址公园以实现遗址及环境的开发利用。2008年,西安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提出将西安建为历史古都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6],2010年,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其理念模式、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均具创新性和代表性,其作为核心带动周边区域有机更新,开创了“大明宫遗址模式”^[7]。总体上,近20年是西安市遗址公园的建设高潮,积极主动将遗址保护与公园形式相结合,寻求遗址保护、区域开发和城市更新的和谐共赢之路。

城市规划对遗址公园建设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在引导城市发展时序和空间功能需求的同时,也

① 本文所指遗址公园是指依托遗址建设的公园,并非狭义上所指考古遗址公园。

指导了大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图2);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增长特点也与城市空间更新、发展、扩张的各个阶段紧密相关,即由中心城区出现,逐渐向紧邻的新城区和近郊区拓展,最后空间变化集中于城市边缘区(图3)。遗址公园发展

过程体现了遗址保护由静态的“历史见证保存”转变为动态可持续的“文化意义传承”、由“以物为本”单一保护转变为“以人为本”整体弘扬,遗址社会价值逐渐放大^[8-9];西安遗址公园不断向世人展现这座古城的多元内涵及历史韵味。

西安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性质	规划特点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53-1972年)》	生产性城市、工业城市	保留完整古城格局,围绕旧城周边建设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80-2000年)》	旅游城市	以明城为中心,保持古城风貌,保护与发展相协调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古城,降低密度,发展组团
《西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都	降低中心密度,保护古城风貌,塑造城市个性

图2 历版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内容变化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main content changes of Xi'an urban master plan in calendar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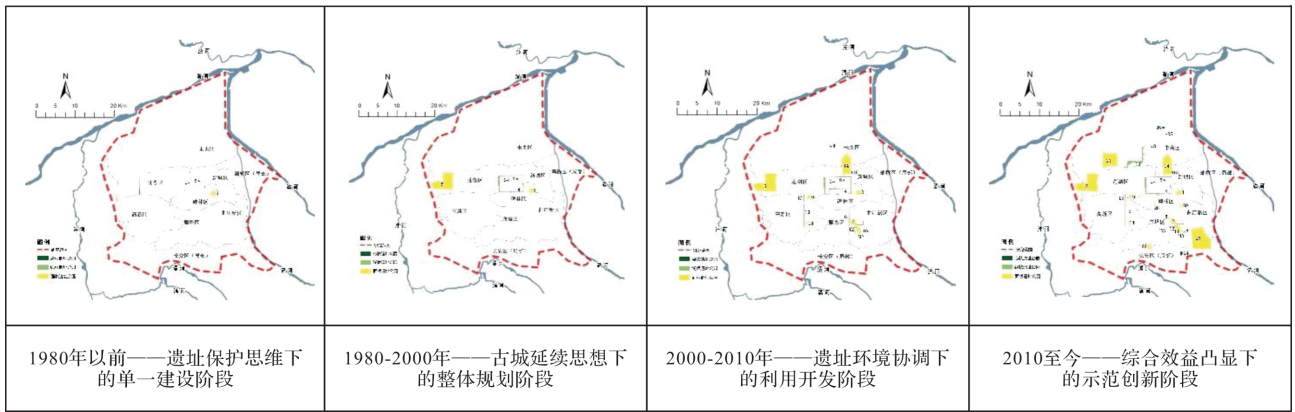


图3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演变

Fig. 3 Spatial evolution of heritage park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1.2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现状空间特征

从文化主题来看,西安主城区28处遗址公园里古都文化类22个,宗教文化类4个,但革命文化类和民俗文化类均只有1个;从遗址年代来看,唐文化遗址公园有13个,清代和近代各仅1个。由此可见,西安市现有遗址公园的文化地域特色性较强,但遗址资源的多样性不够。

从其“公园”属性来看,依据公园绿地相关标准规范,借助ArcGIS软件计算对应缓冲距离,分析遗址公园服务范围(图4),可发现居民步行5 min可达面积109.9 km²,占主城区面积12.2%,步行10 min可达面积180.1 km²,占比20%,步行15 min可达面积252.7 km²,占比28%,整体上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服务范围较广,其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和雁塔区的遗址公园可达性较好,居民可轻易到达并完成日常休闲游憩及文化娱乐活动,其余行政区的遗址公园服务范围较小,不利于城市历史文化氛围的传播和居民文化游憩活动;其次,通过ArcGIS核密度分析,将结果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7级,叠加主城区

行政分区并归纳其整体分布特征,可见主城区遗址公园呈“单核”分布特征(图5),主要集聚在主城区东南部雁塔区的曲江新区,而中心区域遗址公园有集中成片的趋势,边缘区遗址公园集聚度较低,空间分布不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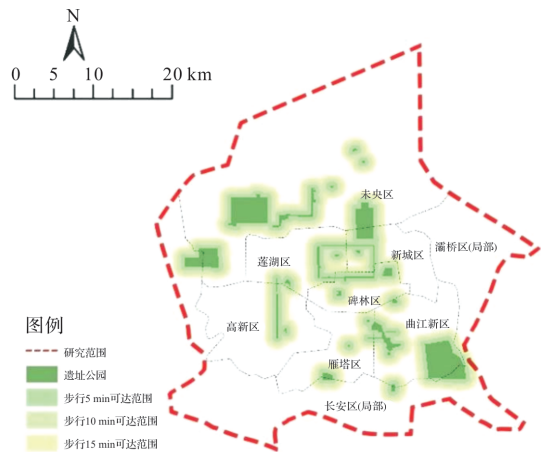


图4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步行可达性分析

Fig. 4 Analysis of walking accessibility of heritage park in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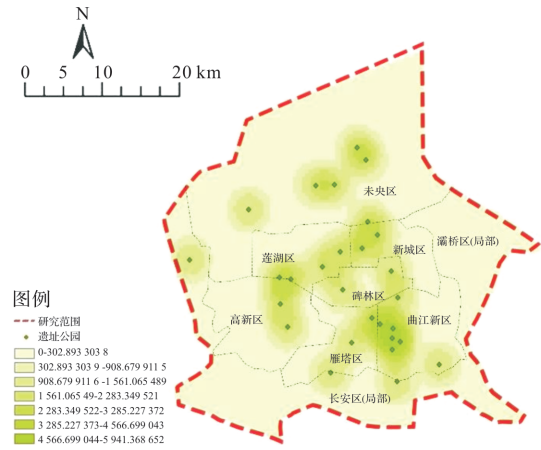


图 5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核密度分布

Fig. 5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heritage park in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近四十多年(1980—2022 年)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数量持续增长,平面形态大致可分为点、线、面状三种类型,其织补完善了城市绿地系统,但在城市空间基底上依旧呈破碎化状态。遗址公园建设有助恢复和彰显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强化城市轴线,增加传统历史空间格局与遗址公园的耦合协调度;将遗址公园现状形态和城市历史片区叠加(图 6),由 ArcGIS 计算得历史片区总面积约 133.9 km²,可发现共 21 处遗址公园与历史片区叠合面积约 28.9 km²,占比 21.5%,但目前遗址公园间的连贯性和联系性有待加强^[10],仍需补充

建设遗址公园进一步展示城市历史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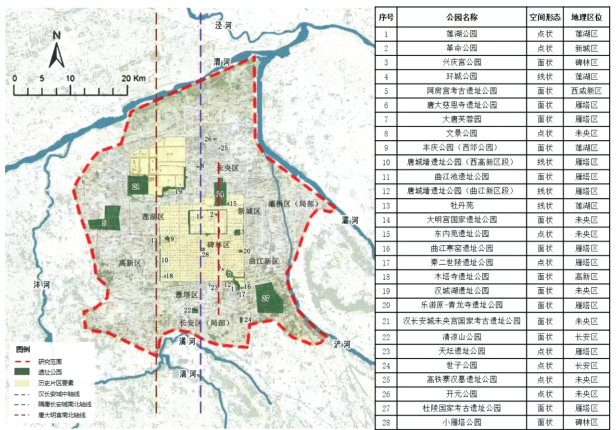


图 6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空间分布与历史要素叠加图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lements overlay of heritage park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Xi'an

2 西安遗址公园发展模式解析

综合考虑 28 处遗址公园所在区域发展定位和用地布局,遗址公园建设初衷、发展演变和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结合近年来西安市空间形态变化特点,从遗址公园与城市“空间-功能”的互动关系出发,可归纳遗址公园的三种发展模式:修补模式、共生模式和整合模式(表 1),并以兴庆宫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和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详细分析。

表 1 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发展模式总结

Tab. 1 Summary of development mode of heritage park in main city of Xi'an

发展模式	空间演进图	特征		典型案例
		空间影响	功能作用	
修补模式		空间影响范围小	对周围片区功能的修复性较强	兴庆宫公园
共生模式		空间影响范围中等	对周围片区功能的统合性较强	曲江池遗址公园
整合模式		空间影响范围大	对周围片区功能的重塑性较强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1 修补模式

修补模式遗址公园多位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居住用地为主的老城区,利用遗址公园进行绿地渗透和绿网织补恢复缺失的文化生态功能、补充生活文化设施、提高公共绿地品质,激发片区活力。

此类遗址公园多为点状或线状空间形态,规模面积和空间影响范围较小,涉及资源利益较少且建设迅速;因此,修补模式下的遗址公园注重对片区文化生态功能的修复,在提高城市绿地率、强化历史文脉和生态特质的同时,能引入居民生活

必需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休闲娱乐业态,以此提升宜居品质;但该模式遗址公园对区域整体推动作用较弱。

以兴庆宫公园为例(图7),1958年,在唐兴庆宫遗址西南角建设的兴庆宫公园^[11]建成开放,内部大致分为娱乐区、健身区和观赏区,作为片区绿心,兴庆宫公园景观风貌和功能定位都具有典型城市公园特点。公园处于居民区中,其建设偏向以公共生活为导向的公共绿地空间更新,公园休闲游憩功能超过了内在的文化意义。对城市而言,现代西安延续着隋唐长安城市格局,兴庆宫公园位于隋唐长安城东西轴线廊道上,它的建成进一步凸显了古城格局;另一方面,兴庆宫公园

绿化面积高达37 hm²,绿化覆盖率达公园总面积的86%,公园丰富多样的植被和较高的绿化指标也改善了西安生态环境和区域气候。60年来,兴庆宫公园多次改造,遗址公园满足了人们在生活、生态方面对城市绿地空间和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其在片区发展中扮演着“绿地补丁”的角色。同时,依托遗址建设的兴庆宫公园凭借其盛唐文化氛围和山水园林景观打造了城市中的生态休闲交往地,吸引市民游客健身游憩和休闲娱乐。总之,兴庆宫公园建设是对城市功能的修补和对空间布局的优化,不仅展示了西安历史沿革和形态风貌的变化,还承载了周围市民的生活体验和集体记忆,对延续旧城文化生活起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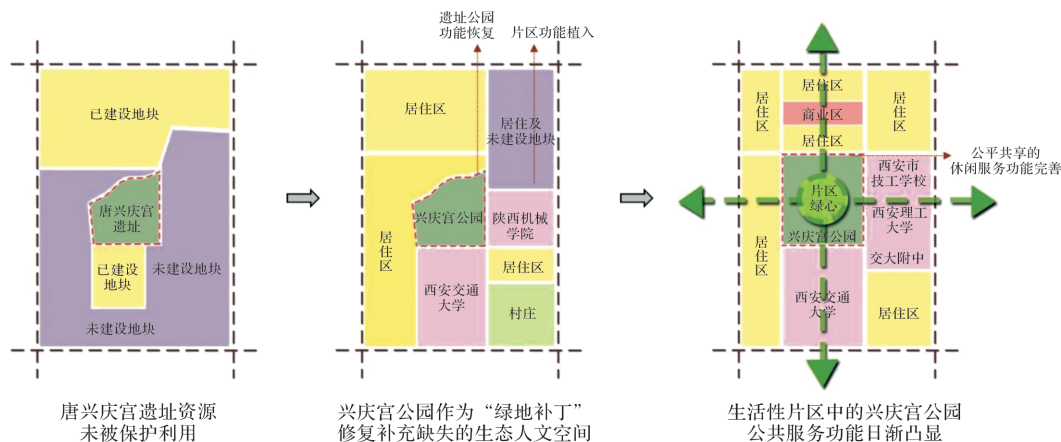


图7 兴庆宫公园及片区空间演进示意图

Fig. 7 Diagram of Xingqing Palace Park and its spatial evolution

2.2 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指遗址公园空间本底优越且环境品质优良,多致力于打造主题性精致开放空间,以契合片区发展定位、协调融合传统与现代化功能、实现片区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竞争力提升。此类遗址公园多位于文旅、商业和科教集中的新区,其规划建设时间相对较晚,作为组织片区空间功能的主导核心要素,功能统合性较强,规划建设时序与片区整体相关且一致。因此,共生模式下的遗址公园空间影响范围中等,多依托公园内部的绿色开放空间构建特色化城市地标,结合其高品质的游憩服务设施进一步承接城市大型品牌活动^[12]、地域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和区域交流交往活动。此模式的遗址公园在协调城市新功能时,多注重遗址主题特色开发和对城市片区的统合带动作用,会弱化对遗址的关注,易忽视对遗址资源的保护和遗址价值的彰显。

以曲江池遗址公园为例(图8),随着新区和遗址公园建设,形成了以曲江池遗址公园为中心,周边辅以居住、商业和文化服务等功能的人居空

间发展模式。曲江池遗址公园服务于曲江新区文旅发展目标和游客多元文化景观诉求,通过恢复性再造历史人文景观达到功能和环境的协调^[13],着重塑造“公园”休闲游憩功能、注重文旅的创新性开发设计以体现休闲生态主题。对于曲江新区来讲,曲江池遗址公园与新区其他五座遗址公园共同构成了曲江系列遗址公园,规模高达100 hm²,从生态角度完成对城市新区绿色空间的调整和补充,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对于西安市来讲,曲江系列遗址公园因面积规模较大、分布集中,形成了市区独特的生态景观带和历史人文新地标,保持着遗址公园与城市空间的互促共生状态。

综上,共生模式的曲江池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为适应新区功能,积极与城市更新改造相结合,完成了西安市主城区多元人文空间的更新置换,塑造了城市新形象的同时提高了城市绿化率,带动了周边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和生态人居环境的整体改善^[14],这是西安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共生共荣的新模式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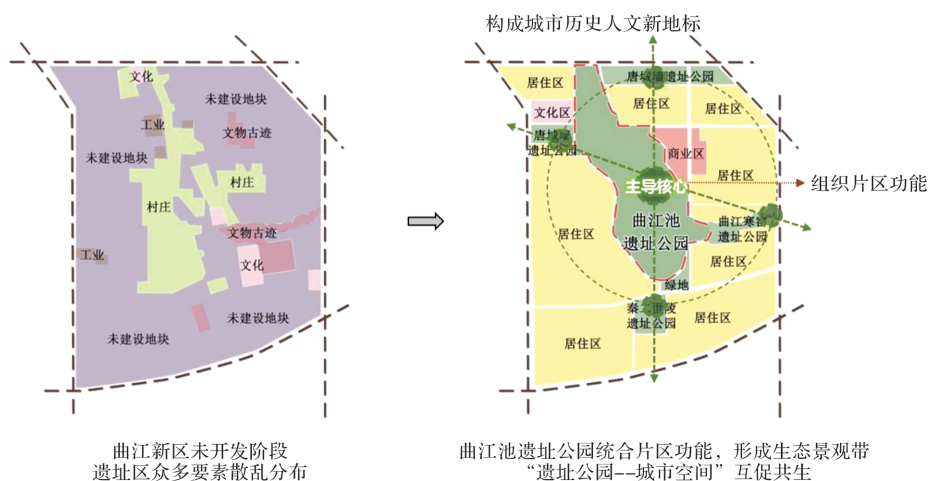


图8 曲江池遗址公园及片区空间演进示意图

Fig. 8 Diagram of Qujiangchi heritage park and its spatial evolution

2.3 整合模式

整合模式指遗址公园作为片区和城市更新发展的前置性、基础性要素,其规划建设能促使片区消除阻碍要素、控制无序要素并整合积极要素,达到空间有序调整、功能有机组合和片区组团发展。此类公园多为面状形态,规模面积和空间影响较大,建设前遗址区内要素杂乱或有危及遗址本体安全的可能性,建设过程涉及大量用地及功能的置换。因此,整合模式的遗址公园对城市功能重塑与活力氛围激发的推动力较强,一定程度上能带动所在片区多方面显著发展,引领城市转型,但此类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伴随多方利益资源变化,建设过程缓慢且难度较大。

以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图9),民国时,大明宫遗址区因铁路建设成为难民聚居之地,并催发商业区和工业区的形成;1995年,西安市第三次总体规划提出旧城外建新城的模式后,大明宫遗址区由郊区变为市区,周边用地为居住、工业和公共绿地,此时呈散点状空间特征。2005

年《唐大明宫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要求公园建成后变更周围用地性质,之后遗址区开始风貌整治,包括用地重组、城中村拆迁改造和道路拓宽延伸,这改变了片区空间形态,此时空间特征为依托道路的带状延伸式;2008年,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始建设,2010年建成开放后遗址公园触媒效应逐渐凸显,并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周边商业和居住呈组团状向周围扩散,该地段也转变为城市新区。总体上,随着西安城市扩张,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空间区位由北郊棚户区到城市建成区再发展为城市新区,遗址区及周边的空间形态特征随着遗址公园建设、城市发展和规划管理政策也发生改变,即由散点状到带状再到组团状分布^[15]。

综上,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破了该区域各类要素交织的局面,推动城市格局更新,重塑城市主要轴线,形成标志性空间;通过遗址公园的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文化再生、路网完善和人居环境改善,有效引导破碎化空间的整合重构,遗址区达到了各类要素的平衡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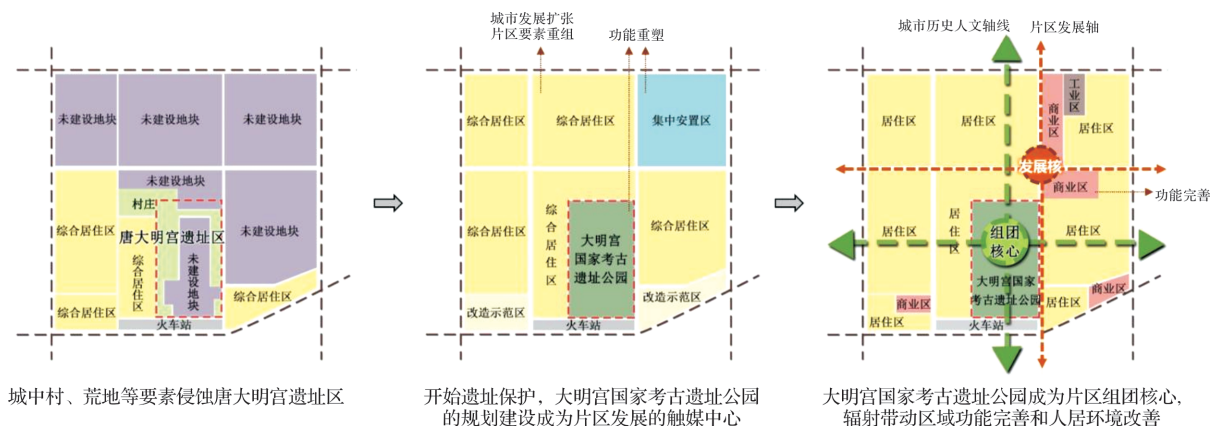


图9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片区空间演进示意图

Fig. 9 Diagram of Daming Palace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park and its spatial evolution

3 基于绿色城市更新的西安遗址公园空间发展模式优化策略

西安以“遗址公园之城”作为发展目标,加强文化城市的构建;而遗址公园作为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兼具的媒介空间,其提供的生态游憩功能和文化传扬功能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紧抓“一带一路”绿色城市更新的契机,依托丰富多样的遗址资源,针对遗址公园现状空间特征及发展模式,从绿色城市更新理念出发,以遗址公园作为城市更新的手段,从多尺度视域对遗址公园系统和个体提出优化策略,提升西安绿色空间容量,提高公园绿地空间品质,优化居民生活环境,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改善环境、惠及民生、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

3.1 战略引导:空间理念革新——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今天城市发展更多将人与自然放在同一价值体系中考虑,形成“人—城市—自然”三者互融互动循环,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也是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路径^[16]。西安在转型过程中要注重发掘利用遗址资源所代表的众多“文化资本”,结合遗址背景环境优化现有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新型遗址公园,同时将绿色化、智能化理念融入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全过程:规划期贯彻绿色低碳理念、建设期运用绿色创新技术、运营期形成绿色治理管理。协同国土空间规划、结合城市发展演进及遗址公园内部情况建立动态化精细化的预测系统,对西安市遗址公园进行未来情景模拟与演变预警,实现动态灵活的遗址公园调控模式,促使遗址公园形成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并重的发展模式。

3.2 重点路径:布局体系更新——孤立到整体的转变

遗址公园模式是城市对自身历史文化底蕴特色的探索开发,也是城市发展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见证;因此,在当前提倡绿色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遗址公园规划建设需立足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全面考虑自然生态特征^[17],关注生态环境产生的绿色价值,通过“城市双修”将遗址公园的文化主题空间、自然生态空间及休闲游憩空间有机融合,并以遗址公园为媒介完善城市绿色网络系统和历史人文系统,构建公园绿地十分钟服务圈,形成公园与城市、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实现人本理念下“人、城、境、业”

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将现有遗址公园承载的人文资源融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有效手段是构建整体性、多层级的遗址公园体系统协调并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18]。根据点状、线状和面状形态不同,遗址类型、文化内涵特点不同,以及市级、区域级和街道级的等级不同,全面梳理并分类加强管控。

点状遗址结合遗址面积、片区人口规模和功能,可考虑引入多中心组团式的公园模式,占地面积较小的遗址建成口袋公园或街头游园等小微绿地,结合其他类型绿地形成生态斑块,既丰富了公共文化空间,又增强绿地空间的组团感和可达性,实现市民出行300~500 m到达公平共享的绿色空间。线状遗址公园是联系城市绿地系统和遗址公园体系的纽带,有机整合线状遗址等文化生态景观,拓宽延续线性遗址公园,提升主城区线状遗址公园的景观品质并构建城市生态绿廊,使其与城市水系相联系,提高蓝绿空间的连通性,建立蓝绿生态网络^[19]。面状遗址公园规模大且涉及区域广泛,可发展成为区域绿地组团中心;位于城市中心区的面状遗址公园可作为城市生态基质,调节市区生态系统,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位于城市边缘区的面状遗址公园可与自然山水结合,统筹郊区的自然生态景观,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在不同形态、规模和等级的遗址公园发展模式的构想下,因地制宜构建遗址公园之城,完善城市历史空间格局,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人文的均衡发展。

3.3 基础塑造:功能模式创新——平庸到特色的转变

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园林绿化景观和开放性绿色生态空间,三种发展模式的遗址公园皆综合了多种功能,挖掘提炼每个遗址公园独特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突出差异化、多样化的文化主题特色;设计历史感和地方感并重的建筑及设施^[20],构建生态智能的文化体验消费场所,加强自然与人、设施与人的互动,提高遗址公园的人文关怀及服务质量,满足人们对于绿色空间的多元需求。

结合三种发展模式的特征和不足,将其优化为更适合市民生活的绿色高品质模式。修补模式的遗址公园应从宏观城市发展角度出发,结合城市战略目标,利用片区现存空间文化资源形成文化生态链,集合片区的资源、品牌、经济和社会要素,丰富遗址公园的内容形式^[21],增强人文系

统和生态系统的联系性,创造自然、人文与创新并存的多层次生态交往空间。共生模式的遗址公园应及时更新改造内部的文化要素,在真实保护遗址基础上,综合考虑格局地形、植物水体、建筑单体等要素设计^[22],塑造多功能场景、提供差异化体验,与文化旅游产业功能进一步融合,并建立与城市空间、产业发展的耦合机制和框架模式^[23],使共生模式的遗址公园通过功能耦合方式由片区文化内涵的传播走向区域文化旅游价值的凸显。整合模式的遗址公园促进区域形成稳定组团发展模式之后,可引导其跨区域与其他遗址公园实现多维度协同联合,依托政策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开发区域文化产品,实现空间功能与市场要素的一体化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结语

遗址公园是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针对西安遗址公园空间分布不均衡,联系性不强等特征与不足,由遗址公园与城市“空间—功能”的互动研究,总结西安主城区遗址公园的三大发展模式:修补模式、共生模式和整合模式。总体而言,西安市应立足于绿色发展完善遗址公园模式,通过构建功能齐全、多层次多等级的遗址公园体系、织补西安绿色网络系统,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实现以遗址公园为依托的城市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游憩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加速西安成为“一带一路”西部沿线上独特的绿色节点城市。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曹恺宁. 城市有机更新理念在遗址地区规划中的应用——以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地区整体改造为例[J]. 规划师, 2011, 27(1): 46-50.
CAO Kaining. Application of organic regeneration in historic preservation planning: Xi'an Daming Palace example[J]. Planners, 2011, 27(1): 46-50.
- [2] 黄倩, 耿宏兵, 阳建强. 绿色城市更新理念及其内涵初探[C]//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201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2 城市更新).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1767-1775.
HUANG Qian, GENG Hongbing, YANG Jianqi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city renewal and its connotation[C]//Vibrant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autiful Habitat: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02 Urban Renew-
- al).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2019: 1767-1775.
- [3] 姚迈新. 绿色城市更新: 内涵、目标及问题治理[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2, 36(2): 52-57.
YAO Maixin. Green city renewal: Connotation, goal and problem governance[J]. Journal of Shaanxi Academy of Governance, 2022, 36(2): 52-57.
- [4] 张程远, 董卫. 城市核心区大遗址的保护性利用思考——以隋唐洛阳城宫城区遗址规划为例[C]//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0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9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548-558.
ZHANG Chengyuan, DONG Wei. Thinking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arge sites in the urban core: Take the planning of the ruins of the palace city of Luoyang cit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s an example[C]//Spatial Governan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hina Urban Planning Annual Conference (9 Urban Cultural Genetic Protec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 Media Co. Ltd., 2021: 548-558.
- [5] 龙小凤. 西安历次城市总体规划理念的转变与启示[J]. 规划师, 2010, 26(12): 40-45.
LONG Xiaofeng.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change of all previous master plan concept in Xi'an[J]. Planners, 2010, 26(12): 40-45.
- [6] 翟斌庆, 徐博. 汉长安城的历史形态演变与遗址区村落保护[J]. 中国园林, 2019, 35(6): 126-130.
ZHAI Binqing, XU Bo. The historic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of Han Chang'an city and preservation of villages on the sit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35(6): 126-130.
- [7] 王新文, 张沛, 张中华. 城市更新视域下大明宫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检讨及优化策略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2): 125-128.
WANG Xinwen, ZHANG Pei, ZHANG Zhonghua.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of Daming palace ruins area space in the urban renewal horizon[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2): 125-128.
- [8] 王璐. 以价值“延续性”为导向的新时代大遗址利用理念方法与活化路径[J]. 中国文化遗产, 2022(4): 16-32.
WANG Lu. Conceptual methodology and revitalization path for the utilization of large-scale sites in the new era: Oriented by the continuity of value[J].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22(4): 16-32.
- [9] 王新文, 高建洁, 付晓萌. 城市型大遗址社会价值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9): 30-34.

- WANG Xinwen, GAO Jianjie, FU Xiaomeng. Discussion on the social value of large urban sit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0, 27(9):30-34.
- [10] 杨阳,王晶懋.城乡统筹视角下西安城市公园系统构建[J].北方园艺,2018(15):108-114.
- YANG Yang, WANG Jingmao. Construction of Xi'an urban park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J]. Northern Horticulture, 2018(15):108-114.
- [11] 菅文娜,岳邦瑞,宋功明.兴庆宫在城市空间中的角色演绎 从宫殿到遗址再到文化休憩公园[J].风景园林,2012(2):33-37.
- JIAN Wenna, YUE Bangrui, SONG Gongming. The evolving role of Xingqing palace in urban spac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2(2):33-37.
- [12] 王忠杰,吴岩,景泽宇.公园化城,场景营城——“公园城市”建设模式的新思考[J].中国园林,2021,37(S1):7-11.
- WANG Zhongjie, WU Yan, JING Zeyu. Park integrating city and scenes constructing city: New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park city”[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 37(S1):7-11.
- [13] 刘晶,闫增峰,尚瑞华,等.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声景观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0(3):423-428.
- LIU Jing, YAN Zengfeng, SHANG Ruihua, et al. The research of soundscape evaluation in Qujiang relics park[J]. J. of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50(3):423-428.
- [14] 吴欣,崔鹏.历史遗址公园场所依恋特征分析——以西安曲江池遗址公园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6(4):606-610.
- WU Xin, CUI Peng. The feature analysis on place attachment of historical relic park: A case of Xi'an Qujiang pool relic park[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6, 46(4):606-610.
- [15] 付晓萌,张沛.大明宫遗址区空间演化机制与规划提升策略[J].规划师,2020,36(1):47-51.
- FU Xiaomeng, ZHANG Pei. Spatial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planning strategy of Daming Palace site area[J]. Planners, 2020, 36(1):47-51.
- [16] 周蜀秦,李程骅.文化创意产业驱动城市转型的作用机制[J].社会科学,2014(2):66-75.
- ZHOU Shuqin, LI Chenghua. On the mechanism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o drive urban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4(2):66-75.
- [17] 徐毅,彭震伟.1980—2010年上海城市生态空间演进及动力机制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1):1-10,59.
- XU Yi, PENG Zhenwei. Study on spatial evolution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Shanghai urban ecospace in 1980—2010[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11):1-10,59.
- [18] 葛瑶.公园城市视角下遗址公园景观营造策略研究——以西安市兴庆宫公园为例[J].城市建筑,2021,18(30):163-165.
- GE Yao. Research on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heritage pa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k city: A case of Xingqing palace park in Xi'an[J].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2021, 18(30):163-165.
- [19] 林坚,叶子君.绿色城市更新: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J].城市规划,2019,43(11):9-12.
- LIN Jian, YE Zijun. Green urban renewal: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 43(11):9-12.
- [20] 付晓萌.“大明宫遗址区”空间发展绩效评价及规划提升策略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20.
- FU Xiaomeng. Research on spac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enhancement strategies of “Daming Palace Site Area”[D]. Xi'an: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2020.
- [21] 王思元.城市边缘区绿色空间格局研究及规划策略探索[J].中国园林,2012,28(6):118-121.
- WANG Siyuan. Research on the green space patterns of urban fringe and exploration of its planning strategi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2, 28(6):118-121.
- [22] 李骥,翟斌庆.中国大遗址“公园化”当中的“原真性”问题再思考[J].中国园林,2016,32(5):117-121.
- LI Ji, ZHAI Binqing. Reflections on the authenticit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ruin parks in China[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6, 32(5):117-121.
- [23] 刘敏,张晓莉.国家文化公园: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到区域协调发展[J].开发研究,2022(3):1-10.
- LIU Min, ZHANG Xiaoli. National cultural park: Cultur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to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J].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2022(3):1-10.

(编辑 吴海西 沈 波)